

■观察家

增加黄金储备对我国有多重战略意义

□张望



■人物志·张望

上海银监局副研究员, 博士。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政策研究室和上海银监局政策法规处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政策、宏观形势、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改革。

目前, 我国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规模日益庞大, 人民币升值预期单边持续。伴随我国经济金融开放不断扩大, 美元贬值和国际游资集聚的市场风险也正逐步逼近。改善外汇储备结构, 避免外汇储备大量损失, 有效减缓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单边压力, 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真正可控、主动和渐进, 已是当前不可回避的话题和任务。增加黄金储备来改善外汇储备结构是近来较频繁的呼声。但就我国目前及未来发展看, 增加黄金储备的主要目的, 不仅是保证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 更主要目的是借助我国外汇储备充裕的时机, 旨在为我国积累真正雄厚坚实的“家底和基石”, 为抵御未来完全开放环境下各种危机的冲击建立有效屏障。增加黄金储备对我国战略意义和作用主要有三方面:

有利防范经济金融危机冲击

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目前我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黄金储备为 600 吨, 约 1929 万盎司。这一数字自 2002 年 12 月以来没有变化。中国黄金储备仅占外汇储备的 1.3%, 也远低于其他国家采用的 3%—5% 的标准。原因在于: 一是对黄金战略意义认识不足; 二是过于追求美元储备的短期收益。因为黄金更多是作为一种最后避险的保障。但是, 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 2003 年以来, 美元债券收益率也连续下降, 我国也开始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所以, 应当把握时机逢低吸纳黄金, 实现黄金储备的正常增长。

虽然增加黄金储备会增加储备成本, 甚至在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和低迷情况下还会出现储备资产损失, 但只要采购黄金的时机与价格合理, 并通过黄金衍生交易工具进行有效避险, 保值的总体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有利稳定和改善人民币未来

预期, 保卫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据预测, 今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将突破 1 万亿美元。持续快速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 已经面临美元贬值和收益率下降的影响。同时, 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 直接使人民币处于强烈升值压力之下。在我国外汇市场风险对冲产品和机制尚不丰富和完善的情况下, 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导致了大量投机资金进入国内, 影响货币政策调控, 还使外汇市场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面临较大风险。所以, 仅从市场风险和避免外汇储备损失的角度看, 改善储备结构十分必要。同时, 从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角度看, 目前改善外汇储备更具有战略意义。

去年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 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不断发展, 外汇市场的业务类型和品种构成不断增加。既有人民币兑外币业务品种, 又有外币对外币业务品种; 既有人民币兑外币的即期品种,

又有人民币兑外币的远期品种和掉期品种; 既有竞价交易方式, 又有询价交易方式等等。但是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调控作用十分有限。

如果货币当局明确将在适当时机改善外汇市场结构, 适时增加黄金储备, 即便是一种迹象和信息, 都会对市场预期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双向预期博弈局面, 有效抑制投机资金规模, 有利形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稳定机制。特别是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处于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维持较大的黄金储备规模, 适时增减黄金储备数量, 是一种调控国际收支和汇率的重要手段。以目前为例, 假如按照 550 美元/盎司价格购买黄金, 增加黄金储备 6000 吨, 我国将耗汇约 1000 亿美元, 市场预期将发生较大改变。

有利满足我国黄金需求, 实现“藏富于民”的战略计划, 间接实现“藏富于民”的目的。去年我国黄金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224 吨和 253 吨, 居世界第四位和第

三位, 需求缺口约 30 吨。我国黄金需求长期处于比较旺盛的状态, 这是我国百姓对黄金的偏好所决定的。我国应该把增加黄金储备和开放民间黄金市场、增加民间黄金持有量联系起来, 更好地使黄金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双增”。

目前, 有关部门调整了外汇政策取向, 鼓励百姓和居民购汇用汇。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 而且从战略角度看, 黄金稳定的价值和货币商品属性, 使“藏富于民”比“藏汇于民”更有意义和价值。一方面, 居民持有黄金, 可以满足心理需求, 同时, 能用黄金保值, 抵御通货膨胀, 并可通过合理运用黄金市场投资实现增值。对于国家来说, 出现危机时, 居民手中的黄金也是一种维持稳定的重要手段。

国内现有人均黄金持有量不到 0.2 克, 属于比较低的水平, 与世界人均拥有黄金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我国人均黄金增加 1 克, 需要 1300 吨黄金, 对

国家来说, 其潜在的稳定力量非常巨大。从人均拥有黄金量这方面来考虑, 我国的民间需求黄金潜力非常大。而且, 我国黄金常年存在供需缺口, 无论从首饰用金、工业用金, 还是投资用金来说, 都严重不足。

扩大“藏富于民”的关键是拓宽目前的黄金投资渠道, 吸引更多企业和居民参与黄金投资。基于我国目前庞大外汇储备, 完全可以逐步扩大黄金进口, 增加黄金市场实物投放量, 在黄金市场上开辟多样化的实物黄金和纸黄金交易产品, 刺激国内黄金需求。扩大居民转换储蓄资产的选择范围, 增加居民投资渠道, 改善居民资产结构。此举既满足了国内黄金消费需求, 又拓宽了投资渠道, 在实现“藏富于民”的基础上, 实现“藏汇于民”。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人均黄金消费的实际需求会不断增加, 并且随着黄金投资市场的不断完善, 黄金投资需求将呈爆发式增长。

■来自日内瓦

你知道究竟付了多少给银行

□徐千惠

近年来, 银行卡的 ATM 机跨行查询账户余额收费及交易费用等银行的服务费用在不断上升。那么, 如何省下这笔看似不大的银行服务费用呢? 今天, 不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最近, 有一项针对美国的一些银行和存款机构 ATM 机收费及其他方面收费的调查显示, 目前美国的银行和存款机构对 ATM 机收费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尤其是银行对没有在本银行开账户的信用卡持有者的每次取款收费平均达到了 1.6 美元。另外, 银行在其他方面的收费也开始上升。例如, 如果储户的银行存款不足或用银行卡透支逾期, 储户将会受到来自银行的罚款, 银行卡透支在美国的平均罚款为 27.04 美元。

根据这项调查, 银行服务费用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 银行对持卡人的银行卡透支消费收取惩罚性费用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自 1998 年开始, 美国对银行卡透支的平均罚款费用一直持续显著增长。在 1998 年秋天, 这项罚款费用为 21.57 美元, 此后就一直在上涨, 迄今这项罚款费用的涨幅已达到了 25% 水平。

那么, 银行卡持卡人如何才能避免透支罚款费用的持续上升影响? 我们认为, 首先是建立一道基本的自我保护防线: 签订透支保护, 将银行卡账户与存款账户相互连接起来。其次是最好保存好所有的银行卡交易记录, 特别是你喜欢的 ATM 机取款, 那就准备好为这项特权付钱吧。当然, 与收取 ATM 机额外费用相比, 银行对自己客户使用其他银行自动提款机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在下降。

同样,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银行 ATM 机的这类收费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在银行卡发卡银行的 ATM 机上取款或查询余额信息等。不过, 我们也有一个备选方案, 如使用借记卡付款交易时取回现金(cash back), 这种应对方法在美国、英国等国是相当普遍的。

确实, 随着银行对银行卡在 ATM 机上进行跨行查询账户余额收费及交易费用等银行服务费用的不断上升, 尤其是银行卡透支罚款, 从善于理财的角度看, 仍然值得我们节省这笔看似不大的银行服务费用。

■多声道

经济并未总体过热 宏观调控仍需点刹

陈东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今年一季度 GDP 增长百分之十之三, 确实高于改革以来的长期平均值。但近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持久性比较好, 依然延续稳中求进的势头, 没有偏离“平稳较快”的增长轨道。有的市场的泡沫非常明显, 出现本轮经济周期以来的二次“局部性过热苗头”, 但总供求基本平衡格局并未打破, 没有明显的总供求失衡。近期国民经济运行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矛盾和问题, 有的生产领域发展速度偏快, 但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并未出现过热。无论从短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看, 实施全面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 促使经济很快“硬着陆”, 是不可取的。

贸易不平衡无法简单用调整汇率解决

吴晓灵(人民银行副行长): 解决对美贸易顺差问题, 需要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共同努力。这种贸易不平衡无法简单用汇率水平的调整来解决, 应该主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解决。亚洲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这既是亚洲国家为了应对流动性危机的需要, 也是由于危机到来时国际援助不及时而被迫采取

■多棱镜

□邓聿文

上周,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今后若干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途径以及政策支持等。可以说, 《若干意见》的出台, 必将对加快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起到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若干意见》的一个最引人瞩目之处, 就是针对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 提出了一个规范意见。去年以来特别是近期, 由外资在装备制造业中的连串并购行为和所谓的“斩首行动”引发的产业安全, 引起了业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讨论。《若干意见》提出: 鼓励社会资金特别是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业的改革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 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 支持其进行跨行业、跨区域、跨

的防御政策。国际上应逐步改变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资产过度依赖一国主权货币的情况。

房价问题更多是统一地价问题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房价问题更多是统一地价的问题, 地价在房价中是有很大问题, 导致地价上升推高房价。房价问题更多是统一地价的问题, 地价影响占很重要的地位, 如何控制地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地价的上升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有问题, 现在基本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分税安排, 地方负担很多支出的义务, 收入来源相对匮乏, 于是土地的拍卖就变成地方政府投机财政来源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有限的供给面前, 地价一定是会上涨的, 地方政府的动力是推动地价提高。

促进经济增长 公共财政应弥补市场缺陷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供给方的四个要素, 即劳动力、资本、科技创新、环境与资源。在尊重市场作用的前提下, 公共财政在这四大供给要素的培育过程中, 应发挥自身职能作用, 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 将那些公共性强或外溢效应明显的领域和环节作为着力点。

(雨人摘编)



■本期人物话语

金融很重要,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戴相龙(天津市市长): 初步考虑金融改革创办的目标是: 根据天津的城市定位和发展实际, 努力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努力实现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 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

国家应掌控装备制造制造业命脉

所有制的重组。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这些规定将有效阻断地方政府随意出售装备制造企业给外资。

鉴于装备制造行业面广、门类多、品种复杂的特点, 其龙头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要多得多。经过机构改革后, 该行业的绝大多数龙头企业都归地方政府管辖, 但由于很多企业的效益不是很好,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政绩考虑, 对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 甚至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动。于是, 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纷纷“沦陷”, 成为外资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由此, 也反映出中央政府正在丧失规划中国工业发展的能力。

至于如何发展装备制造业, 首先, 必须大力加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调控力度。主管部门应有一个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长期规划, 拨出专项资金, 建立专门管理机构, 强化扶持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 支持其进行跨行业、跨区域、跨

市场换技术只会使中国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其次, 一定要着手建立审核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程序和规则, 把个别企业的并购案置于行业发展战略视角下考虑。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进行收购活动有三个基本点: 必须控股, 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 未来收益必须超过 15%。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以资本运作方式, “吃定”中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进而打造自己的全球产业链和实现对中国的垄断。此次《若干意见》使审核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企业有了一个依据, 今后应该加快金融等其他重要行业的外资进入审核机制的建设。

一国装备制造工业的发展程度, 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在强调国家必须掌控装备制造的同时, 我们也要防止两种倾向:

一是保证国家对装备制造的控制能力和主导权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但国家控制不等于国企来控制, 完全而且也应该允

许民营企业的进入。为此, 我们需要克服国企卖给民企一定就是中央政府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装备制造企业后, 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由政府一手主导引进外资, “强迫靓女先嫁”的局面。而且, 由于利益主体明确, 还可减少中国企业在合资中遭受的种种损害。

二是加强国家对装备制造业的调控不等于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调控只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指导、政策制定, 企业的微观经营行为政府不能干预。但目前, 许多地方政府习惯于而且乐意在微观层面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 尤其是对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企业的合资、招商引资、境外并购, 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要么直接操办, 要么行政干涉。政府如果是国有资产的出资者代表, 可以国有股东的身份在股东会层面行使权力, 而不是直接干涉或介入企业的运营。对于国有资本控股、国有资本参股的公司, 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以产权纽带维系的, 更不能介入企业的运营。

■第三只眼睛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杨英杰

从 2004 年国企改革争论开始, 到去年围绕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的争论, 学界以及社会上对历时 27 年的改革的反思和争论不断升温, 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关注的话题。

笔者认为, 争论的起因可以归为一点, 即改革过程伴随着收益权分配(而非收益分配)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 一部分人没有得到应得的, 一部分人得到了不应得的。因此, 对收益权分配的不满, 便转移到了对改革的质疑上。形象地说, 蛋糕在增大, 但一部分人所享用的那部分增速过快, 以至于挤占了其他人所应得的那部分。关键是, 决定谁有权享用更多蛋糕的制度本身, 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

从理论上讲, 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达成某种共识, 从而能创造出更多的收益, 也就是说把蛋糕做大。但是, 制度的选择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某一权力集团(有时需要与其他集团共同瓜分)所决定的。因此, 均衡的制度选择往往可能不是最大化所有人共享的蛋糕, 而是最大化权利集团所享用的那块蛋糕。

也就是说, 大多数情况下, 权力集团所享用的蛋糕份额增速过快, 挤占了其他利益团体应得的份额。因而, 如何抑制权力集团的收益增长速度过快, 保证收益分配权制度的公允和透明, 进而激励在有效产权保护下公民的投资(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 应是解决问题的必经途径之一。

经济学中有一个科斯定理。大意是说, 当不同的利益团体能够通过无成本地进行谈判时, 他们可以通过谈判将潜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比如, 在农田受到工厂污染的情况下, 农民可以付款给工厂以弥补工厂降低污染所带给工厂的损失。可以将此定理应用到制度的选择制定过程之中。有效的产权制度要求执政者能够可信地将他的权力让渡一部分, 但根据科斯定理, 权利集团也要求得到补偿。因此, 从本质来说, 规范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本身需要以权利者让渡出权力与留存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为前提, 这种平衡可以使权利者对未来自身收益的增长具有明确稳定的预期。

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经济的激烈竞争导致政治竞争的加剧, 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经济体内部, 特别是不同经济体内部公民的相互影响, 使得权利者必须对降低内部竞争和外部压力的成本收益进

行比较。因此, 只有当权利者主动让渡一部分权力, 以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权力的可持续性时, 制度转型进程便随之而来。

制度转型或改革之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愈加艰难, 实际上是因为存在一个谁来负担制度转型成本的问题。改革之初, 投入较少的成本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 成本即使不均摊, 全部让权力弱势群体去承担, 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反弹。但是, 随着改革成本的日益增大, 制度转型收益跨时期特征更加明显, 即制度转型或改革的收益未必由改革成本承担者来享用, 受益者可能会是下一代人或更远。而已有的成本分摊模式则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会产生不同的声音。这种状况下, 不能只靠道德的规劝来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目前成本分摊模式下每人应承担的部分, 而必须做出让资源控制者来支付转型成本的制度选择, 决不能让资源消费者或服务接受者来承担。之所以这样说, 一是增加资源控制者的成本负担并不会在绝对量上减少其获得的收益, 最多是其收益增长率或有下滑; 二是资源控制者并不必然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权力的掌控者, 因此这种制度选择会得到权利掌握者的支持而变得易于操作。而且, 资源控制者也需要衡量, 如果长此下去, 他们的收益增长速度过快, 保证收益分配权制度的公允和透明, 进而激励在有效产权保护下公民的投资(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 应是解决问题的必经途径之一。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难就难在选择。因此, 我们需要: 第一, 改革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在资源控制集团和广大社会民众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坚定改革的方向, 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力度, 自然是明智的选择。第二, 必须真正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中国的前途将要看中国的农民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能否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持中国的改革。我们认为, 一定要让商业化的生活方式走入农村, 但就目前而言, 土地决不能私有化。因此, 我们相信, 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定会收到“扶正固本、标本兼治”的效果。